

日治時期台灣詩話編輯、校注與研究 價值述略

江寶釵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提供一俯瞰性的觀察，就初步整理散在報章的台灣詩話，回溯相關的編輯、校注、研究，略覽其目前既有的成果，探求從此產生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徑路，證明其內含義蘊的豐富性。筆者嘗試肯認，詩話的筆記形式，承載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謂的「第三空間」。殖民政治下，被殖民者不斷回顧自己的文化之源，重複其文化，同時，與殖民者的他種文化融合、對話，創造新型式的文化實踐，以自別於優勢文化。這樣的作為使得對古典詩的論述呈現通俗化的趨向，在與性別意識、滑稽趣味、地域空間的交涉時凸出庶民美學，與菁英美學對話——正是諸種異文化交織與交錯的具體結果，這些面向都使得台灣詩話的整理與研究，有其毋庸置疑的必要性。

關鍵詞：日治時期、台灣詩話、校注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Poetry Commentaries, Annotations.

Chiang Pao-Chai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rigins of Taiwanese Poetry Commentaries, why editing discussions of poetry that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newspapers is important. By evaluating the literary value of Taiwanese Poetry Commentaries, this article is also engaged how the authors for which pay their undivided attention to canonical poetry, and, through reviewing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give sincere advice on how classical poets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the canon, how one should write and read classical poetry, and how they should interact with society.

This article assumes that the trivial note-taking form of poetry aptly carries a “third space,” where, under colonial politics, the colonized repetitiously review the origins of their own culture, repeat its content and form, and at the same time, blend and converse with the other cultures of the dominators, creating a new prototype of cultural realization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the dominant cultures. This phenomenon becomes crystal-clear in the examination of canonical classics. These observations can be based upon records of poetry with the aid of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such a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nd annotation of poetry collections.

Keywords: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Poetry Commentaries, Annotations.

日治時期台灣詩話編輯、校注與研究價值述略

一、前言

詩歌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已是論者的共識。何以然？這是由於人類文學的起源幾皆始於謠歌，從謠歌發展為詩歌，它與人們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的個人情緒、人際溝通密不可分。有關詩歌理論出現得比較晚，但或遲或速，它也一定會出現。如果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詩歌文學暨其理論思想，絕非虛言。理論係實物作品的形象抽繹及理念概括，看起來似乎僅屬「小眾」，但它處理的卻是原則性的問題，如：一首好的詩需具備那些條件？這是所有的文學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因而它更具備普同性。尤其二十世紀以後的西方，文學理論勃興，各色觀點、論述，淆然紛陳，其後，甚至與文化研究結合，如今已成為學界主流。

中國文學史上以片段文字吉光片羽地論詩歌，可謂早已有之。這種以片段文字抒論詩歌，是詩歌理論的前身，後來更發展為詩歌理論，世謂之「詩話」，其發展與源流，在台灣的相關知識撰述、研究等生產活動，以及未來可資研究的視角，可能為台灣文學史做出的貢獻等等，皆為本文的關懷。¹因而，本文為一概覽性質的研究，旨在界定範疇，略述源流，提供目前已爬梳的文獻、相關研究概況，抉發其價值、意義、未來展望，冀能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

二、詩話溯源暨其在東亞的傳播略論

具備怎樣的形式性質可以被視為是詩話的一部份？蔡鎮楚在《詩話學》一

1 本文在文獻資料的整輯上，多蒙李知灝、謝崇耀兩位博士協助；在有關中國詩話源流的論述上，則獲黃清順博士的指教；在台、中、日、韓詩話的互文關係部份則有賴吳亦昕博士的意見。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亦給予筆者莫大的啟發，因而在第一節、第三節做大幅度的改寫。

書中認為詩話與說話、詩品、民間詩話、²筆記小說、詩格、語錄、詩條等類似文體有所區別，主要是因為它具有以下的基本要素：

第一，必須是關於詩的專論，而不是個別的論詩條目，甚至連古人題序跋記中的有關論詩的單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詩話。

第二，必須是由一條一條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聯綴而成的創作體制，而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篇詩論。

第三，必須是詩之「話」與「論」的有機結合，是詩本事與詩論的統一。一則由於是閒談隨筆，講詩歌故事，故名之曰「話」；二則「詩話」又是論詩的，是「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的契合無垠，屬於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³

專論、條述是其形式，而事論合一、及辭及事是其內容。準是以觀，只有符合這三個條件的作品，才能稱為「詩話」。則是否為詩話，與書名是否為「詩話」無關，諸家不復為「詩話」之名所牢籠。以丁福保所輯《清詩話》，共收錄詩話四十三種，以「詩話」為名者不過十五種而已。⁴因而，筆者在整輯相關詩話時，如《台灣詩乘》、《詩海慈航》等撰述，雖不以詩話命名，仍舊視其為詩話，主要判斷根據在於內容是否涉及論詩意見。聊以《台灣詩乘》為例，書中不僅搜輯詩家、佚作，而且對詩中相關的地景、風物、掌故等展開言說，是故被視為詩作。⁵茲舉一小節為例：

鄞縣張蒼水尚書曾與延平郡王北伐，招撫江西，敗後入海，嗣與王同定台灣。及見王無西意，遺詩誚之。有「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王

2 如敦煌文獻中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即為民間詩話，為說唱文學的樣式，並非論詩之體裁。

3 蔡鎮楚，《詩話學》（中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頁30-31。

4 未以詩話為名者，如王士禛《律詩定體》、趙執信《談龍錄》、沈德潛《說詩碎語》、翁方綱《五言詩平仄舉隅》、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錄》、袁枚《續詩品》等。又，此係文友林文龍先生的提點，筆者檢尋、統計的結果。不敢掠美，特此為誌。

5 《台灣詩乘》蒐羅張煌言詩作，有關台灣詩話不以詩話為名而實為詩話者，根據筆者的爬梳，詳後文表二、表四、表五。

一笑而已。無何王薨，子經嗣，益鬱鬱不樂，遂散舊部，隱于浙江海上，為清吏所得，慷慨授命；事載《台灣通史》。尚書名煌言，字玄著，工詩文，善治兵，延平禮之。

上引這段話略述張蒼水的生平，論內容，語故實，記時事，後並舉列其作品〈感懷兼悼延平王云〉，皆其為詩話之證。

詩話爭鳴，多在詩作鼎盛之際。詩話不止是對於詩人、詩作的評述，也是當世文學體製、文學理論與詩家身世故事與思想的紀錄。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道：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⁶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對上引章氏之論作了如下的分析：

章氏這段論述，大致包含四層意思：其一，他開宗明義地斷言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其二，與此同時，他又注意到古代經傳中若干論詩之語的存在；其三，他承認古代經傳的論詩之語對詩話的濫觴作用，但又明白指出其濫觴之義與詩話起源的顯著區別；其四，他進一步指出《詩品》是古代論詩著作中「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古人論詩，大都一鱗半爪，吉光片羽式的，雖為名家，卻非專門；而以「專門名家」論詩者，則是自鍾嶸《詩品》始，開後世專門名家以詩論體裁論

6 章學誠著，王雲五主編，《文史通義》冊二（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75。

詩之先路。⁷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關於詩話是否始於鍾嶸《詩品》，歷來見解不一，言人人殊，⁸但章氏所例舉的「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公孫丑上》）、「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詩經·大雅·烝民》）等等「論詩」名言，表明了中國論詩、言詩的傳統淵遠流長，⁹其來有自，則是「不刊」的事實。不過，也正如同蔡鎮楚在分析完前揭「章氏之論」以後所指陳的：

正如羅根澤先生所指出的：「《詩品》確是勒成專書的論詩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詩話本源。」（《中國文學批評史》）因為《詩品》並不與「詩話」同一性質、同一旨趣，也不符詩話之體所特有的體製與風格。歐陽修《詩話》自序，說《詩話》純乎在於「以資閒談」，司馬光《續詩話》也指出詩話屬於「記事」。由此知之，早期詩話原本是「記事」以「資閒談」而已，與鍾嶸《詩品》之「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並不相同。¹⁰

據此，回溯詩話源頭，若在義界與體製上要有明確的認定，那麼就不得不承認郭紹虞的說法是最無疑義的了，郭氏明言：

7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中國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頁12。

8 詩話的起源，歷來有如下各種說法：其一，編輯《歷代詩話》的清·何文煥主張「昉於三代」；其二，清·章學誠認為「本於鍾嶸《詩品》」；其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表明「出於（唐代）孟榮《本事詩》」；其四，清·吳琠則另開新路，提出「出於詩律之『細』」（案：因杜甫「晚節漸於詩律細」之語而來）。詳參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7-17。

9 2001年上海博物館公布一批收藏（1994年發現）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已有不少學者指出，該批資料係先秦儒家的詩學散論，雖因斷簡殘篇無法確實拼湊其體系，但從「詩三百」文本出發，直探「詩三百」本身題旨和意義的作法實可視為後世「詩話」的濫觴之一。案：相關資料可查閱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中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4）、俞志慧，〈竹書〈孔子詩論〉的論詩特點及其詩學史地位〉，《漢學研究》21卷1期（2003.06），頁23-45。

10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13-14。

詩話之體，顧名思義，應當是一種有關詩的理論的著作。溯其淵源所自，可以遠推到鍾嶸《詩品》，甚至推到詩三百篇或孔、孟論詩的片言隻語。但嚴格地講，又只能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為最早的著作。¹¹

以上，將詩歌作為主要談論對象，並明確以「詩話」為書名的專著，目前所知，是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為最早的著作」。要之，歐陽氏該書，確定了詩話的短小體製，及其「以資閒談」的性質。如是短章隨書以為談話之助的作品，往往意到筆隨，不成系統，故詩話早期的特質，只能說是論詩的「閒話」，如同隨手的札記，逐條綴屬，卻並未有一定而具體的書寫目的，這樣的情況，不論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溫公續詩話》、劉攽的《中山詩話》、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周紫芝的《竹坡詩話》、呂本中的《紫微詩話》……等等論著，「皆以『閒談』為宗，以『記事』為主，重在詩歌本事的記述，用事造語的考釋和尋章摘句的欣賞，往往寫得娓娓動人，讀來津津有味，風格與『軼事小說』十分相似。」¹²如楊慎《升庵詩話》「小姑無郎」這一條：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樑。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¹³

上引這一段先考釋用事造語，尋章摘句，最後述小姑之本事；本事中充滿著軼事小說的意味，洋溢著閒談的意趣。

不過，自黃庭堅「江西詩派」以後，宋人論詩章法漸成氣候，推敲字句、鑽研詩法，乃至形成具體主張的理論風格也漸寢蔚為潮流，據張少康觀察表示：

11 郭紹虞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前言》（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34。

12 引用蔡鎮楚《中國詩話史》的評論，頁66。

13 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來源：<http://home.educities.edu.tw/f5101231/f52.html>，2011.09.15）。

最早的詩話是以「記事」和「資閒談」為目的而寫的……從現存詩話看來，北宋前期詩話並不多……詩話的大量出現，是在北宋後期南宋初期，正是黃庭堅和江西詩派活躍時期，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因為黃庭堅和江西詩派注重詩人的學問和講究具體的詩法，對格律和文字推敲得很細、很具體，甚至可以說是很瑣碎的。而且黃庭堅周圍有很多學生，他們相互之間對詩歌創作有過許多研究討論，這都為詩話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在客觀上大大促進了詩話的迅速發展。江西詩派中許多人都詩話著作……江西派詩法是北宋後期到南宋初期詩話的一個主要內容。詩話的內容也比歐陽修、司馬光時期的「資閒談」、「記事」更加擴大了。¹⁴

尤其南宋時期，除特重詩證、詩辨、詩論與典故探討之外，整體著作的「針對性」、「系統性」和「理論性」的特色也日趨明確，我們可以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扼要陳述來獲知端倪：

南宋詩話……出現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實質性的突破。這種實質性突破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詩話創作的針對性。……南宋人往往有意而為詩話，詩話進入了詩學理論批評的領域。……其二，詩話體例的系統性。……南宋詩話……在編排體例上已經對初期詩話有所突破，出現了按內容分類的創作體例。例如嚴羽《滄浪詩話》，由〈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部組成，分門別類，序列清楚，從論詩內容到體例形式，自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三，詩學理論的探索性。……至南宋，詩話的重心則由詩本事和詞句考釋之列轉到詩學理論上面，在總結詩歌創作經驗，研究詩歌理論方面，表現出一種可貴的探索精神。¹⁵

南宋詩話的「針對性」、「系統性」和「理論性」特色，實則成為後世詩話的

14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5 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94-195。

準繩和典範，不論是遼、金、元、明，以迄於滿清階段，各朝各代關於上述三項特色，均有深足的挖掘和擴展。當然追隨北宋初期信筆短章、以資閒談的風格之作，仍大有人在，只是措意於詩學理論體系的建構者，亦是代不乏人，至若衍為詩派、標榜宗法的專業取徑，也明顯地躍居詩壇主流地位。

總上所言，自南宋以降，歷經元、明、清三朝的發展，詩話撰著，愈益蓬勃。原本的「以資閒談」，也轉而變成具理論意義的文學批評，門類趨於多元，內容變為詳審，揆其大概，若歷代源流、一朝一代、師友宗派、聲韻平仄、名媛閨閣……等等，無不涵括。

再者，宋、明、清臻於高峰的詩話，也成為東亞漢文化圈獨特的、共有的詩論知識體系。以韓國為例，徐居正的《東人詩話》撰成於成宗五年（1474），是朝鮮第一部以「詩話」為名的著作，是為萌芽期。發展期則約始於仁祖中至肅宗間，相當於順康時期。這時期的詩話家如金昌協《農岩雜識》論詩以自然為宗，指責明人宗唐模古、議論入詩；另一方面，南龍翼《壺穀詩評》、金萬重《西浦漫筆》等深受復古派詩話影響，肯定七子的價值，指出其詩有其自得之處。逮哲宗初，詩家論明詩首推李圭景，他承繼家學，深造於漢學，撰有《詩家點燈》凡1390餘則，對於明詩的評論，內容豐富，識見卓出。韓詩話的興盛期，約英祖中至哲宗間，相當於清中葉。這個時期的詩話家頗衣被錢謙益的影響，如李宜顯《陶谷雜著》抨擊胡應麟、鍾惺、譚元春的说法，就很接近錢氏的觀點。¹⁶

如果說韓國詩話從一開始就受到歐陽修開創的詩話體的影響，那麼日本詩話主要係受唐人詩格的影響而逐步發展起來。《文心雕龍》和《詩品》早已見諸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的著錄，惟一般推日本詩話的始祖卻為流傳於十七世紀初期的《文鏡秘府論》，視為日本詩話萌芽期。¹⁷踵繼而來的繁榮期，則從十七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相當於日本歷史上的江戶時

16 李聖華，〈論韓國詩人對明詩的接受與批評——以韓國詩話為中心〉，《古代文學研究》4期（2007.07），頁201。韓國詩話傳統當然不是此地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此地僅在略舉一、二例，略見其漢詩話之傳統而已。

17 張伯偉，〈論日本詩話的特色——兼談中日韓詩話的關係〉，《外國文學評論》1期（2001），頁20。

期（1600-1853）。在這期間，日本學者已能掌握此一源於中國的詩歌批評工具，對於中國詩歌的發展以及中國詩話所關注的理論問題都有多方面的思考和討論。因茲而產生的作品頗多，如芥煥彥章《丹丘詩話》、祇阮瑜《詩學逢原》、山本信有《作詩志彀》、原直《詩學新論》、雨森宗真《詩訟蒲鞭》、皆川原《淇園詩話》、西島長孫《敝帚詩話》、菊池五山《五山堂詩話》、古賀侗庵《侗庵非詩話》等等。¹⁸ 隨著洋學大興、漢學衰亡，詩話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芒，進入了蛻變衰落期，其始肇約發生於明治維新的十九世紀迄今。儘管如此，當時知名的作品仍不在少數，如野口甯齋《少年詩話》、河井醉茗《醉茗詩話》、太田晴軒《白醉軒詩話》、中根淑《石窗閒話》、林鶴梁《醉亭詩話》、矢島梨軒《梨軒詩話》、吉川幸次郎《人間詩話》等。也有諸多漢學相關叢書的出版，池田蘆洲編的《日本詩話叢書》（鳳出版）十卷，收錄江戶時代五十三位文人的詩話六十六種，足見詩話於日本漢學的重要性。

以上對日、韓詩話傳播的考察，僅止於浮光掠影，用以說明詩話為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重要資產。其傳播之詳狀，或日、韓之間詩話的旅行，可能交互影響之軌跡，又是否直接或間接地進入於台灣等等，這些都是複雜的議題，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並不足以申論，亦非本文論旨所在。至於日本詩話，它一方面紹緒中國，一方面霑溉其治下的台灣，其影響是直接的。易言之，緣於日本曾經統治台灣地區長達半世紀之久的事實，日本漢文圈的詩話理念也就循著日、台文人的交流而發生互動。因而，日治時期的台灣詩話的淵源固然以中國為大宗，與日本詩話學關係之密切，尤有值得詳實觀察的必要，目前也累積了若干成果，如黃美娥、楊永彬、王幼華、高野史惠等，¹⁹ 俱有所見。筆者披讀《瑞桃齋詩話》，也發現該書所載錄的日人詩作，頗見於森春濤所編輯的漢

18 譚雯，〈明代詩話與日本詩話比較研究〉（中國：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

19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47卷3期（1997.09），頁43-88。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0.08），頁105-181。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台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為例（1895-1925）〉（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臺灣學研究》7期（2009.06），頁29-49。

詩雜誌《新文詩》。²⁰此外，日本統治階層善用報紙快速傳遞的功能，擴大官紳唱和的影響，加速政令的推動，將《臺灣新報》贈閱台地紳商，有效地擴大了讀者群的規模。台、日詩人的作品同時都藉由此一新的發表管道，進入台灣詩話作者的閱讀場，《瑞桃齋詩話》所載錄的台日詩人活動與作品距《臺灣新報》創刊不到半年的时间。1926年〈青崖仙坡兩詩伯將於來月一日來臺〉²¹的報導之後，謝汝銓《奎府樓詩話》即出現國分青崖之詩文與略歷之引介，²²凡此皆可以看出台日詩話家訊息流動之迅速。在對漢學詩歌知識的生產上，中國、日本傳統與台灣本土相遭遇時的交互激盪，而展現出多元而繁複的內容，續詳後論。

總之，台灣在十九世紀初期對中國、日本詩話的接受位置，使它成為東亞漢字文化圈裡比較詩／話學一個重要的據點。

三、台灣詩話概覽與相關研究

簡短述明詩話在東亞的傳播概況以及台灣的相對位置後，我們在此進入台灣詩話的範疇。

回溯台灣詩學的萌芽，始於明鄭時代。清代兩百餘年，台灣位居文化地理的邊緣，經過遊宦人士與本土文人的激盪，古典詩創作在同光年間，進入高峰期，詩話始於當時，宦遊者、本土文人對於詩應如何寫，應如何學、如何評騭等的相關論述，日趨熱絡。日治時期，特殊的時空背景蘊蓄了特殊的歷史情境，文化地理的邊緣位置依舊，而台灣人身分出現兩個祖國（中國／日本）的雙重性，殖民政府的攏絡政策造成詩社勃興，報刊的文藝欄刊載不輟，專業性的詩文報刊也頗有讀者，古典詩歌相關知識的生產，盛於一時，造成台灣傳統詩學幾乎凌轢對岸中國的時代情境。但若僅就台灣詩話之專著以觀，雖然有陸續問世之作品，內容多為台灣本地掌故而在日治間撰成的詩話，約十數種，在

20 江寶釵、李知灝，〈世變下吳德功的學思轉折——一個奠基於《瑞桃齋詩話》的思考〉，吳德功原著，江寶釵校注，《瑞桃齋詩話校注》（高雄：麗文出版社，2009.03），頁1-58。

21 〈青崖仙坡兩詩伯將於來月一日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26.10.20，4版。

22 雪漁，〈奎府樓詩話〉，《風月報》46期（1937.08），頁6。

量上稍顯稀少，為人所知者有限，原因是其發行不集中。其他見於報章雜誌者，文獻零散，為人所知者更少。2003年謝崇耀能掌握的詩話種類為三十餘種，目前在謝崇耀與筆者共同再做蒐集後，大約有五十餘種。台灣詩話應如何設定範疇呢？目前可掌握的台灣詩話，究竟有那些？可資整編的文獻材料又有那些？如何進行整編的實務？已完成整編的詩話文獻又有那些？本文以日治時期為範限，略事整理並摛論其研究大概，以及可能的視角等等，詳後述。

（一）試論台灣詩話的整理與編輯

何者為「台灣詩話」？在這裡，我們參考黃得時對台灣文學範疇的論述，並用以為標準。作者「出身台灣」、「久居台灣」、「一定期間在台灣從事文學活動」、「出身於台灣，他的文學活動在台灣之外的地方實踐」、「僅作品中出現台灣書寫」等，重要性依序減少。²³

依此，可以確認的判斷是：如連橫《台灣詩乘》等人出身台灣，一直在台灣進行文學活動，他們的作品自然屬台灣文學的著作；清光緒年間蔡德輝來台，並居住頗長的一段時間，對台灣詩壇有其影響，他的《龍江詩話》自然也可以列入台灣詩話的探討對象；遺憾的是，這本詩話至今僅見其目，未見其書。第四、第五類則暫時未找到相關文獻。至於如趙翼《甌北詩話》、陳衍《石遺室詩話》、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等。這些作者短暫來台，詩話內容對台灣詩壇的著墨不多，也未在台灣發表，對台灣詩壇的影響微乎其微，是故此處並未以「台灣詩話」視之。

立「台灣詩話」的範疇之後，乃可進入台灣詩話的整編實務階段。筆者的做法是就專著出版與報刊刊登兩類為主。前者爬梳文獻材料，後者則有資料庫者，就資料庫進行檢索，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尚無資料庫者，則逐頁翻查，如《風月報》。將檢索翻查所得影印匯集。如是經年累月，遂將日治時期相關文獻中的詩話，依以上的分類，得到以下數種，茲陳列為表格。

23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葉石濤編譯，《臺灣文學集（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08），頁4。或參見葉石濤編譯，《臺灣文學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02），頁2。他又說，短暫逗留的及其他人，只有必要時才提及他。頁3。

表1：以詩話為名之自行出版專著

詩話名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目前出版狀況
臺陽詩話	1905	自行出版	王松	有
瑞桃齋詩話	1921	自行出版	吳德功	出版校注版
寄鶴齋詩話	1895-1914 (推測)	自行出版	洪縵	原著電子書再版
趣味集古今滑稽詩話	1931	自行出版	江介石	
鐵峰詩話	1934	自行出版	許天奎	

表2：不以詩話為名之自行出版專著

名稱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目前出版狀況
臺灣詩乘	1921	自行出版	連橫	收入雅堂詩話，出版中
詩海慈航	1939 (推測)	自行出版	謝汝銓	

表3：以詩話為名之台灣報刊雜誌刊載者

詩話名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讀酒樓詩話	1906.7.17-20 (2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未署名
咳珠樓詩話	1907.8.3-10.24 (3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白水
蘸綠村詩話	1907.9.10-10.28 (7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未署名
掬月樓詩話	1907.8.2-1908.1.10 (19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謝汝銓、蔡佩香
大冶一爐詩話	1909.1.22- 1911.11.28 (207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胡殿鵬
意園詩話	1909.5.8-1910.2.3 (2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勞勞生
瑞軒詩話	1910.12.26- 1911.3.20 (13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連橫
神州詩話	1910.4.27-5.8 (2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天繆生
滇南詩話	1911.7.30 (1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南少年

詩話名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瞻廬詩話	1911.8.22 (1號)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未署名
陶村詩話	1924-1925 (推測)	臺灣詩報	張純甫
鐵峰詩話	1925.7.25-9.25 (2號)	臺灣詩薈	許天奎
	1935.10.1 (1號)	詩報	
百納詩話	1933.7.1-1935.9.7 (48號)	詩報	葉文樞
詩話	1933.2.6-4.15	詩報	李春霖
百衲詩話續編	1942.1.22-6.27 (9號)	詩報	葉文樞
二南詩話	1941.5.8-1942.6.21 (34號)	詩報	周召南
淮詩話	1941.6.22-8.21 (3號)	詩報	鄭坤五
蓬萊角樓詩話	1936.8.6-1937.1.6 (7號)	風月報	謝汝銓
奎府樓詩話	1938.7.20- 1939.12.1 (27號)	風月報	謝汝銓
風月詩話	1940.8.1-1941.1.1 (4號)	風月報	周德三
閩秀詩話	1940.8.15 (1號)	風月報	蔣培中
滑稽詩話	1940.6.15-8.1 (3號)	風月報	一葦
滑稽詩話	1930.10.9- 1932.5.19 (9號)	三六九小報	鄭坤五、趙鐘麒、 劉魯、駐鶴軒主
歪詩話	1930.12.13- 1932.7.16 (2號)	三六九小報	許丙丁、著意會幹 事
消夏歪詩話	1931.8.19 (1號)	三六九小報	古圓
古今逸詩話	1931.11.13 (1號)	三六九小報	不俗
紫珊草堂詩話	1932.1.9 (1號)	三六九小報	雙木生
挹秀閣詩話	1935.4.19-5.19 (1號)	三六九小報	黃凝香
綠波山房詩話	1933.3.19-4.6 (6號)	三六九小報	邱濬川
圓園詩話	1933.3.1-11.26 (2號)	三六九小報	邱濬川
萬善同歸詩話	1934.7.23 (1號)	三六九小報	古董先生

詩話名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詩話	1932.12.3 (1號)	三六九小報	李春霖

表4：不以詩話為名，而有詩話之實者

名稱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拾碎錦囊	1905.7.1-1907.7.2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黃植亭等人

表5：非詩話作品，但內容涉及詩歌作品、詩學活動

名稱	出版時間	出版者	作者
花叢小記	1930.9.13-1934.9.3	三六九小報	花道人
花叢小記	1935.5.26	風月報	笑花生
楊花點點	1911.3.2-1911.4.2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小叩生
調冰雪藕	1909.7.11- 1909.9.2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逸濤山人等人
葭蒼露白	1909.10.12- 1909.11.1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圖南詩史
璇閨雜詠	1909.12.29- 1909.12.3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胡殿鵬
紅袖餘香	1910.2.1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圖南詩史

製表：李知灝、謝崇耀 修訂：江寶釵

以上為筆者初步整編的結果。整編的原則強調台灣詩話原著之整理、呈現，尊重台灣的「詩性」特質，暨其發表的脈絡，因而在整編上先依家數分類，為獨立詩家作品者選擇較佳版本做為底本，獨立一冊；不同家數則因性質整合，如滑稽、閨秀各自類聚。至於編次成冊則以時間的軸架。就此之外，當然仍有其他的整編方式，詮釋性的分類便是一種可能性。未來有興趣者，便可以就詩家風格、詩體論述等，另作整編。

前列表中所發現的詩話文獻材料，多在報章雜誌，證明本節一開始的觀察。「詩話」以簡潔文言編織並議及古典詩歌相關的種種知識，其創作有待於腹笥飽滿之士。詩話作者早期如王松、洪繻、吳德功等，皆為跨越時代的宿學名儒。但在日治後期漢文教育受到壓迫，「言文一致」漸成趨勢，新文學興起以及新舊文學論戰中對舊文學的攻擊，古典文學的創作空間相當程度地受到壓縮。二次大戰後期，皇民化的推動、漢文欄的廢止，在在形成漢文創作的限

制，詩話的撰述邁入衰微。²⁴

(二) 有關台灣詩話的「編輯校注」之研究概況

近年來，隨著台灣文學的蓬勃發展，台灣詩話的相關整理與研究亦有所見，儘管數量仍極有限，大致可以分為校勘、勘而有注、附箋評者等不同的取徑，略述於茲。

校勘部份，吳福助在參與「全臺詩」校勘的過程中，曾抽出《台灣詩乘》²⁵中的詩歌作品部分加以校訂；謝崇耀〈連雅堂《瑞軒詩話》介紹〉²⁶一文中，將原刊於《臺灣日日新報》中的《瑞軒詩話》重新繕打，並做初步的整理；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²⁷，對於《寄鶴齋詩話》版本間的差異進行比對，並訂正其錯誤；李知灝〈王松《臺陽詩話》版本考述與校勘〉²⁸，則比對《臺陽詩話》的諸多版本，經校勘後，對部分文字提出修正。

詩話原文無論其傳播的形式為何，以筆者之見，校勘都是首要之務，否



24 就表一、二所列，出版詩話專著共七種，見諸1937年以後的，只有《詩海慈航》一種；在報刊方面，刊出的詩話為四十種，見於1937年以後的，只有《奎府樓詩話》等7種；可登刊的場域也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等6種，僅剩《風月報》與《詩報》2種。

25 施懿琳編，《「全臺詩」技術報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3）。根據吳福助所述版本有：始於1917年，完成於1921年，1924年2月至1925年10月，分13回陸續發表於《臺灣詩薈》的最初本。「一九五〇年薇閣詩社捐資，委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校訂出版，為《臺灣叢書》學藝門第一種。一九六〇年一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收編為《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四種。茲據《臺灣文獻叢刊》本，輯錄書中所選詩，少數零句、聯語不收，詩題依據連氏所引述，其中偶有不明確或欠缺者，則依據作品內容試擬，以便利檢讀。」

26 謝崇耀，〈連雅堂《瑞軒詩話》介紹〉，《臺灣文獻》54卷2期（2003.06），頁377-396。

27 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28 李知灝，〈王松《臺陽詩話》版本考述與校勘〉，《臺灣文獻》55卷2期（2004.06），頁111-130。

則，失之毫釐，錯以千里，其例甚多，難以僕數。本文姑且援用一例，此例為《瑞軒詩話》第二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12月28日）錄連雅堂酬答林幼春之詩，「原刊本」《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七句作「千古文章保劫灰」，「保」經查為「付」之誤。

茲將以上《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西元1909年）12月28日《瑞軒詩話》第一則加以詳細校勘，則將發現，多處異文，請將重點分析列表於下：

《臺灣日日新報》原文 ²⁹	異文	判斷
「挾天」	《劍花室詩集》「拔天」	《臺灣日日新報》為是
「保劫灰」	《劍花室詩集》「付劫灰」	《劍花室詩集》為是
幼春詩與雅堂詩俱無詩題	1. 連橫詩題為「酬幼春」 2. 幼春詩見《南強詩集》，題為「柬雅堂」 又見《鷗社藝苑》第4集，題「贈連劍花」	待進一步查考

此僅係一則詩話，其出入如此，校勘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固毋庸再綴。

比起校勘的重要性，注解的重要性不遑多讓。以筆者曾經校註的張達修詩為例，如〈九日登大肚山〉「登臨興不敗催租，指點中州入畫圖」一句，中州，一般指的是神州。但明明在大肚山登高，寫的是大肚山周圍的秋景：「林表寒香黃橘柚，江千秋水滿菰蒲」，又如何突然跳躍到中國神州去呢？則中州應指台中州，這是借喻。又如王安石「專壑」，是不是「專心於一壑」？還是「將山林據為己有」？³⁰

校註的工程較諸校勘，尤其浩大，數量是以不多。目前台灣詩話文本之整理與校註專著，僅見林正三、李知灝、吳東晟輯錄《臺灣近百年詩話輯》³¹與吳德功原著、江寶釵、李知灝編輯《瑞桃齋詩話校注》³²，以及刻在出版中的

29 案：詩題「柬雅堂」，《南強詩集》（1964），頁29；又題「贈連劍花」，《鷗社藝苑》第4集（1955），頁130。

30 江寶釵，〈序〉，江寶釵、林文龍、李知灝編，《生事歸清恬——張達修詠讀臺灣百首精選譯註》（台北：駱駝出版社，2006.07）。

31 林正三、李知灝、吳東晟輯錄，《臺灣近百年詩話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32 吳德功原著，江寶釵校注，《瑞桃齋詩話校注》。

《雅堂詩話》。其他詩話著作尚未進行全面的校勘或註釋。

林正三、李知灝、吳東晟輯錄之《臺灣近百年詩話輯》為詩話選刊，計收錄王松《臺陽詩話》、吳德功《瑞桃齋詩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許天奎《鐵峰詩話》、李漁叔《三臺詩話》當中，談及「台灣」詩人之部分，將相關文字摘出，並稍加註釋。雖有助於以「台灣」主題的呈現，但文獻收集不足，摘釋內容亦即為有限，無法呈現各家詩話之全貌。

江寶釵校注、李知灝責任編輯之《瑞桃齋詩話校注》，則以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為底本，將詩話記載中的作者生平、詩作典故詳加校對、註解。一方面保留原本《瑞桃齋詩話》之樣貌，復加以訂正、補充。《雅堂詩話》則以《台灣詩乘》為底本，並蒐集雅堂散於各種詩文集刊或報刊雜誌的論詩條目，加以編輯，校訂方法與體例略與《瑞桃齋詩話校注》同。此二書應係目前較全面蒐集而完整呈現的台灣詩話作品重編。

至於其他相關研究中，亦有對部分詩話內容進行整理者。

（三）有關台灣詩話的研究專書與論文發表概況

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所有文學的基礎文本，其最終目標在於開展論述，呈現當代文化的研究取向，學者思維的心靈內容。因而，底下便就目前已展開的研究論述稍做說明。

在詩話內容的研究方面，多集中在單篇論文與學位論文方面，目前所見專著只有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³³ 釋臺陽之名義，論其身分、文化認同與台灣意識，暨其以詩話為史的特性，因而中國文化精神得以藉由詩話傳承於台灣。

在單篇論文方面，早期有張良澤〈讀《臺陽詩話》笱記〉、³⁴ 黃美玲〈王

33 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高雄：太普公關文化公司，2002）。

34 張良澤，〈讀《臺陽詩話》笱記〉（上、下），《臺灣風物》33卷1、2期（1983.03、06），頁27-44、頁23-69。

松《臺陽詩話》初探》、³⁵曾進豐〈許天奎《鐵峰詩話》述論〉、³⁶謝崇耀〈瑞桃齋詩話初探〉、³⁷龔顯宗〈邱濬川的詩觀與風格——由《綠波山房詩話》說起〉、³⁸其要旨多為說明文獻的發現、出版過程、書寫背景與目的、論詩方針等。李知灝〈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以《臺陽詩話》、《寄鶴齋詩話》、《瑞桃齋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為研究中心〉³⁹則探討日本詩人的事蹟與詩作，如何透過報紙、雜誌、官紳唱和、傳抄等傳播管道進入台灣詩話。林美秀、紀偉文〈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⁴⁰則整理《瑞桃齋詩話》「卷二」中記載盛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君臣唱和，烘托文風昌盛的盛世氛圍，從中寄寓吳德功對「聖王」的想像。吳彩娥〈風雅譜系：論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對日人漢詩的評述及其意義〉⁴¹論述吳德功在殖民情境下，在文化上雖認同漢文化，在政治上卻認同殖民政權。有關日人詩事的記載，則是企圖將日人納入「風雅」的譜系，以爭取殖民政治下論述言說的權力。劉振維的〈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⁴²延續一貫的民族立場論洪棄生的創作價值，徐慶齡的〈讀《寄鶴齋詩話》中論《詩經》〉⁴³闡述洪棄生所展現的詩教觀。針對詩話書寫中的

35 黃美玲，〈王松《臺陽詩話》初探〉，《台南家專學報》16期（1997.06），頁29-40。

36 曾進豐，〈許天奎《鐵峰詩話》述論〉，《高雄師大學報》21期（2006.12），頁19-32。

37 謝崇耀，〈瑞桃齋詩話初探〉，《台灣文學評論》3卷1期（2003.01），頁77-83。

38 龔顯宗，〈邱濬川的詩觀與風格——由《綠波山房詩話》說起〉，「第四屆國際東方詩話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5.06.05）。

39 李知灝，〈日治初期社會變貌對臺灣詩話的影響——以《臺陽詩話》、《寄鶴齋詩話》、《瑞桃齋詩話》中記載日人詩事為研究中心〉，蔡振念主編，《臺日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3）。

40 林美秀、紀偉文，〈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期（2004.07），頁1-12。所謂的「聖王」，乃傳統文人心中的聖賢治世，唯有賢君聖主，文明方可振興、文風自然興盛，舉世太平。林美秀、紀偉文，〈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以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中羅列盛清君臣唱和，來凸顯自身對「聖王」治世的渴望。

41 吳彩娥，〈風雅譜系：論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對日人漢詩的評述及其意義〉，「2007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2007.06.08）。「風雅」譜系則是傳統文人品評詩歌風格時用以溯源之語，最早在鍾嶸《詩品》就將五言詩的起源追溯到《詩經》、《楚辭》。吳德功在《瑞桃齋詩話》中，以《詩經》的「風」、「雅」來品評日人之漢詩。以記述台灣風土之作，稱其源自「風」國風的系統；以詩人閒詠之作，稱其源自「雅」大、小雅的系統。將日人漢詩納入漢文化體系中，藉此寄託漢文化廣於日本文化之驕傲。

42 劉振維，〈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南台科技大學學報》27期（2002.12），頁193-211。

43 徐慶齡，〈讀《寄鶴齋詩話》中論《詩經》〉，《雄工學報》7期（2006.5），頁43-56。

性別呈現的討論，則有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藝旦養成教育之書寫研究——以「三六九小報花系列」為觀察場域〉⁴⁴從藝旦的養成過程，指出被藝旦之為特定階層的他者；林淑慧，〈《三六九小報》花系列專欄的女性身影及其文化意義〉⁴⁵由傳播與廣告的角度，探討花系列專欄中，女性形象的被觀看與再現之社會意含。

學位論文而針對台灣詩話之研究者，目前知見的有五本碩士論文：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⁴⁶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⁴⁷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⁴⁸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⁴⁹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⁵⁰其中三本針對洪棄生《寄鶴齋詩話》進行討論。許雯琪詳於校勘，並闡發其詩學論述。吳東晟著重於洪氏詩學體系的建構，並比較其與他種詩話之異同。陳怡如則以為洪氏的詩學體系，乃源自中國文化中的「風雅」傳統。李知灝的〈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考校詩話訛漏，並針對其內容的社會性，暨其詩學體系進行論述。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針對台灣詩話文獻進行普查，比較重要著作在體系上的異同。大致來說，學位論文多傾向對詩話文獻整理與文本內容的分析。

整體而言，目前的相關研究多以王松、吳德功、洪棄生的著作為論述焦點，主要因素為這幾部詩話皆出版有單行本，可見文獻整理與研究熱情的對應關係。九九年筆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正典的混雜、建構與變遷——臺灣詩研究，兼及編輯、整理」，顧名思義，除了正在進行台灣詩話的整理、編輯，同時也將探討台灣詩話論詩所呈現出的正典混雜現象，其建構、變遷、解構與

44 江寶釵，〈日治時期臺灣藝旦養成教育之書寫研究——以「三六九小報花系列」為觀察場域〉，《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6期（2004.12），頁29-63。

45 林淑慧，〈《三六九小報》花系列專欄的女性身影及其文化意義〉，《文化研究月報》59期（2006.08），來源：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9/journal_park448.htm。

46 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47 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48 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4）。

49 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2005）。

50 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

再構。祈願文本系統性的出現能激發後續的研究動能。

四、詩話於「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站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詩話還有那些可研究的價值？前文曾提及日治時期台灣詩話創作之興微，並指出其興微的趨勢幾乎與古典文學的發展過程相映照。換句話說，對於詩話的閱讀，正是吾人把握日治時期古典詩歌生產、源流、傳播的關鍵，因而有其重要性。

蔡鎮楚《詩話學》中曾從詩話內容的界義指出詩話發展的不同階段，他的看法是這樣的：

其一曰「話」，以「記事」為主，重在詩歌本事，屬於狹義詩話階段。
其二曰「論」，以「詩論」為主，重在詩歌評論，屬於廣義詩話階段。⁵¹

根據蔡氏的研究，詩話最早以「話」的形態出現，記錄詩人、詩事以資閒談。經過不斷的發展，詩話的重心就「從詩本事轉向詩學，轉向文藝論與美學論了，這是詩話發展的高級階段。」⁵²但事實上，這幾個階段亦非截然可分。如以下這個區辨詩家風格高下的論述，卻以譬喻而非分析的方式表達：

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⁵³

又如眾所熟知的王國維《人間詞話》將人生「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以詞喻為「必經過三種之境界」，⁵⁴亦然。這類譬喻簡短扼要，近乎雅雅閒

51 蔡鎮楚，《詩話學》，頁30。

52 同註51，頁93。

53 (梁)鍾嶸，《詩品·卷上·魏陳思王植》(來源：<http://www.cll.ncnu.edu.tw/hpoet/ha2.html>)。

54 此三境界分別為：「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人間詞話·二六》(台北：學海出版社，1982.09)，頁13。

談，有別於正襟危坐的理論架構，其出現，一在魏晉六朝，一在清末。則根據詩話書寫形態論定其時間發生之先後，用茲建構有關詩話發展之線性論述，似有一定的困難。

雖然溯求詩話的線性發展歷史有一定的難度，但詩話的內容多元而豐富，則因茲而可能建構的詮釋框架也必然充滿各種可能性。前引章學誠所謂「論詩而及事」、「論詩而及辭」的議論模式，其實就是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等著作的議論特色，故較具備隨意性，不易形成系統。嚴羽《滄浪詩話》，由〈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部份，已經系統大備。近代學者的研究，更提供了新的思維框架。蔡鎮楚《詩話學》的論述，頗具條理性。其《詩話學》一書，根據歷代詩話體系的分類，將詩話內容分為詩歌本質、創作、風格、鑑賞、批評、作家、詩體、詩史等等。敘事上的抒情、言志、說理，題材上的詠物、記事、寫景，⁵⁵ 風格或作法上的格調、聲調、肌理、性靈、神韻等，近人劉若愚更援用西方詮釋框架，將之分別置入形上論、決定論、表現論、審美論的範疇；⁵⁶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殊具借鏡的價值，可以做為詮釋框架的初基。

詩話是具體的詩歌評論，如前引鍾嶸孔門用詩的譬喻，更有對詩歌原理的種種思維。張伯偉在〈中國古代詩話的文化考察〉一文中的看法：

從宋代開始，由於各個時代的文化或多或少存在著差異，因而各個時代的詩話也就或深或淺留下了特定的印記，形成其時代標志。從文化角度研究詩話的時代標誌，……也能幫助人們透過詩話這一射角，窺見各個歷史階段在思想、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時代折光。⁵⁷

如果詩話是一個文學研究要處理的對象，它具備什麼樣的文類特質呢？即前引章學誠所謂的詩話「及事」的性質，這是一般文學作品較為少見的。詩話作為

55 崔成宗，《宋代詩話論詩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7.06）。

56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09）。

57 張伯偉，《中國詩學研究》（中國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290。

文本的內容自身，即文學史之一環，它幾乎扮演著一種平台式的角色，舉凡詩壇軼事、詩家生平、交遊，乃至活動之場所，皆到處群聚，可供爬梳當時詩歌知識生產傳播網絡之背景。其次，詩話探討詩家的養成，詩家或其作品風格評述、不同詩歌體裁的美學判準等等，為建立詩歌理論之張本。詩人所處的位置，各個不同時代環境脈絡下的詩話或關於詩話知識之生產等等，共同形構了詩話的文學史的性質。

誠如張伯偉所說，詩話零碎，隨興任意的書寫方式，經常地流露有意或無意的各種意識層面，這些意識層面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放在文化研究的範疇，便彰顯其非常的意義。詩話家將他們的文學觀點寫入詩話之中，掌握詩話，便足以建構其人文學觀之藍圖。詩話論詩，並作為文學文本的閱讀對象，足以代表當代的審美觀。

站在台灣詩話的立場，它既有對宋元明清詩話的繼承，亦有歧異與開新。繼承方面，台灣詩話亦屬筆記性質，以風物叢談為主，保留了記事、資閒談的性質，以最經濟的語言承擔「存作者」、「錄文獻」、「知方物」之責任，如前舉詩乘中關於張蒼水的言說；雖未必形成嚴謹的詩論體系，卻也考溯詩歌源流、勾稽本事，抑或鍛鍊章句、陳述理論等，既有詩家與文本實際的比較批評，也有對創作原則、修辭方法的說明與開示。其賡續漢文傳統的用心與致力，不言可喻；至若開新層面，則一方面與西方進步現代性、日本漢學的移入，密切相繫；另一方面則和台灣本土用語的「在地性」滲透，發生關聯。因而，台灣詩話的特色，便有幾方面可以談。

西洋文化藉著進步現代性進入台灣，對傳統文人產生影響，詩話家自然也在詩話中有所回應。對於各種現代性器物的引進、記錄與描述，詩話中的相關敘事不勝枚舉，如德律風為Telephone的音譯，而有「訪舊惟憑德律風」的吟詠。⁵⁸又如鄭坤五以為言語不過是音聲符號，各國各地言語不同，是因其出處不同的緣故。不過，其中也不乏有類似者。他舉了一個很有趣味的例子：

58 施梅樵，〈南遊雜詠〉，《梅樵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06），頁124。

「ババ。ママ」此爸爸媽媽也，為東西洋小兒呼父母之共通語也。在本島則謂屬飽飽ママ，俗謂小兒未解言語時求食之表示符號也。余謂此較東西洋之認為呼父母之意更正確。蓋未知言語之小兒，除食以外，因不知父母為何物也。⁵⁹

這是在拿譯入語與台語做比較，並予以社會視角的詮釋。不僅如此，鄭坤五與連橫都主張以現下區域語言進行書寫，鼓吹本土語言的鄉土文學，但是另一方面，二人也認為可以用和文或其他國家語言、羅馬字、世界語（Esperanto）⁶⁰來補台灣話文表記之不足。以上這兩例，便明顯受到西洋文化影響。

日本直接統治台灣，又挾一脈源遠流長的漢學傳統，對詩話的影響層面尤深，前論已略微觸及台日詩人互動的部份，此地或再鋪述若干視角。我們發現，就詩話選錄的題材言，在不同作者撰著的詩話中，中、台、日人的獲選比例，落差不小。由之是否顯示了某種階級、族裔關係？此一關係如何表徵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社會台灣之間重疊的社群——詩人，他們不同的經驗怎樣去構成一幅紛綸交疊與重錯的歷史，呈現其辯證或呼應的實況？⁶¹謝雪漁的《奎府樓詩話》、《蓬萊角樓詩話》作品選用日人比例高，《拾碎錦囊》所介紹的台灣詩人數量相對多，而《寄鶴齋詩話》裡的中國詩人最被尊崇，由是體現出當時台灣詩壇結構的微妙之處。就詩歌創作言，前文提及的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提出「明治體」的主張，⁶²不僅是將中國詩話轉為和風的典例，展示漢文化如何日本化，並且突顯了做為帝國南方邊陲之台灣對內地帝都的仰望。〈讀

59 〈佚題〉，《詩報》192期（1939.01），頁29。

60 「所以寫音的字，不如羅馬字的利便」，參見鄭坤五，〈就鄉土文學說幾句〉，《南音》1卷2號（1932），頁12-14。「我輩處此文運交會之際，能用固有之華文，可也；能用和文，可也；能用英、法、俄、德之文，尤可也；則用羅馬字以寫白話文，亦無不可。」參連橫，《雅言·四六》（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21。關於兩人如何主張世界語，詳筆者另文〈日治時期臺灣民族文藝的形塑與流動〉，未刊。

61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 p264.

62 鵬，〈大冶一爐（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2.14，4版。胡南溟提出的明治體主張詩作基礎主張：「聲律要高唱入雲，大聲發于水上」，「雄氣邁倫，不粗不聾，不委不靡，矯健控縱，最忌平直」。

酒樓詩話〉為現存所知於大眾傳播媒體發表的第一篇「詩話」，深具文學史意義，未署作者，其中將翻譯自日本漢詩風格的論述，以及日人漢詩寫作風格，稱之為「和習」、「倭臭」等，與「臺習」、「臺臭」相比較。⁶³

在殖民統治引進的現代化潮流裡，新式基礎教育（與科學對舉）與報刊雜誌的傳播，使得底層人民（相對於菁英階層）的重要性日見顯著。特別是印刷現代性。我們發現，詩話的撰述者——傳統文人，他們的身分已因為種種因素產生微妙的改變。一方面，因應著報刊補白之需要，另一方面，考量報刊廣大閱讀群體之水平，作者由是特開出「諧謔」一脈的作品，《上海時報》載有〈新詩經〉三章，以嘲嫖客之染梅毒者。⁶⁴ 在台灣，則不僅出現以趣味、滑稽、顛狂為名的詩話或詩歌專欄，著有專書，更有以此撰成的「新聲律啟蒙」，⁶⁵ 以為教育新世代之所本，直接影響學習者的啟蒙。趣味滑稽為中國庶民文學特色之一，在此之前，卻從未出現被納入教本之正典化現象⁶⁶。然則，台灣報刊詩話的若是發展，固然是中國詩話資閒談傳統之緒餘，是否受到日本大正通俗文學植入的影響⁶⁷，從而開展出自我特色？其與洪棄生、連橫等詩話家所傳述的雅正一脈的詩話，又形成怎樣的對照？凡此都形成極具趣味的議題。

台灣詩話另一特殊性也可見諸性別意識的呈現。殖民政府倡導全民教育，設女子學校，⁶⁸ 使得女性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女性的角色扮演（role play）非特擺脫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刻板觀念，她們的行動場域，也從家庭，從大門不

63 是篇登載於1906年（明治39年）7月17日至7月20日，共載2號，其云：「內地人詩，自帶倭臭。臺灣人詩，亦自帶固有之台臭。內地人讀本島人詩，未能悟其妙處。本島人讀內地人之詩，常覺其俗氣撲鼻。」即為以倭臭、台臭分疏台、日人作品之一例。

64 江介石，〈趣味集奇譚〉，《鐵花仙史》（台北：廣文書局，1980.03），頁14。

65 《三六九小報》署名子曰店主的〈新聲律啟蒙〉曾連載多時，使用語言為台語，其內容之滑稽成分則如：「肥對瘦，脆對鬆，有勢對無空。行經對走腹，押煞對跳童。」1930年（昭和五年）10月26日第15號。

66 正典化（canonization），意謂將之變成為國民必讀的基礎讀物。「聲律啟蒙」係過去童蒙詩歌教育中的必讀經典。這是為什麼此地將「新聲律啟蒙」稱之為正典化。

67 二十世紀一〇年代末期到二〇年代初期，世界面臨帝國崩解、經濟大恐慌、1919年西班牙流感、1923年關東大地震等天災人變，使得日本內部瀰漫著末世的氣氛，英法文學如王爾德大為流行，大眾媒體則出現了色情（エロ／erotic）、怪誕（グロ／grotesque）、胡說（ナンヤンス／nonsense）的文學現象，對時間稍後的台灣文壇，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影響。

68 如三女高，即今日之中山女中。

出，二門不邁，在社會對人力需求增加下，轉入現代化的職場，女記者如楊千鶴屬鳳毛麟角，但車掌、咖啡廳、百貨公司的女服務員則為數眾多。漢詩活動與書寫也處處看到女性倩影。⁶⁹ 在前表五所見被命名為閨閣詩話中，固然以女性詩人、作品、活動為旨歸，在男性詩話家的作品裡，也經常出現與女詩人相關的敘事，如連雅堂、賴子清，肆談女性創作與活動，甚至出現專事教育女子學詩的言說，在此同時，詩話中也經常出現類似「花選」的敘事，夾雜情色的暗示、指點、窺伺或觀看。如此，究竟表彰台灣怎樣獨特的性別意識？

帝國對於所管轄統治的新土地的管理針對住民、野生動植物以及自然環境，進行調查、區劃、命名，俾以均視化地納入「地誌學的想像」（topographical imagination），創作相關敘事，使之易解易記，以成為國民教育的內容，進入國民的感知結構，發展出對這個地方的理解與感情，構成認同，是必要的手段，清代方志、日人五花八門的調查書，都是此一手段施設後的結果。則地理空間所發展出來的感知結構，在詩話中有怎樣的呈現？日人自台灣地景的重構：區域改正、新八景、櫻花的新植、溫泉澡堂的興建等等，改變了台灣人日常生活的空間意識，詩話家對此頗有觀察，如龍淵釣叟在〈拾碎錦囊〉190期中，所提到的則是現今在台灣已非常罕見，屬於泡湯文化之一的澡堂文化，其云：

淫霖迭霈。寒氣嚴凝。精濕薰人。渾身燥癢。屢思浴體，又以解衣凜慄為嫌，旋則夙風乍晴，南風送暖，午餐已畢，脊汗涔涔，因亟返寓，褪去袍服，攜巾赴櫻湯浴房……⁷⁰

當台灣的實質空間、地景、意象滲透了殖民現代性，將虛擬的地理想像用於詩

69 女性嶄露頭角，儘管與男性詩人相比，為數不多，但少數之中，不乏帶領風騷之「奇人頭」，推考她們的身分與創作形態，大抵有三：她們有的是書香世家名門淑媛，幼嫻閨訓，少從漢儒習詩詞，台南蔡碧吟、石中英、嘉義張李德和、鹽水黃金川。有的是青樓名伎，文墨為藝旦養成教育之一環，如台北王香禪。也有的是一般家庭出身的女性，參與當地漢文先生教授子弟的活動，如東勢邱和珍、澎湖蔡旨禪。江寶釵，「台灣古典女詩人」，台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35&Keyword=%E5%A5%B3%E6%80%A7%E8%A9%A9%E4%BA%BA>）。

70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3.15，3版。

歌創作，胡南溟主張不獨宜參閱中原歷史輿地，更應備日本輿圖，「平日爛熟于胸中，下筆方有見地。」即五大洲歷史輿地亦應爛熟一二，以「亞雨歐風，大開詩人之天地。」⁷¹將詩歌創作對日本地理的運用，置於首位，並及於世界地理的關注；又如〈拾碎錦囊〉184期記載「後樂園在東京小石川，即水戶藩主光國公之別邸，寬廣壯大，縱橫千里為本邦第一庭園」⁷²，則是就日化的台灣地理空間的載述。相對於這些反映殖民現代性的連橫則力陳台灣在地主體性之重要性。無論寫物摹景，都應就地取景、就地取境（亦即取台灣景致入詩），不蹈襲中土前賢的陳言套語，不鸚鵡學舌般拾掇古人牙慧，如謂：

「兩乳燕投孤壘宿，四時花共一瓶開。」孫湘南句也。「花無寒燠隨時發，酒長瓊漿不用沽。」六居魯句也。而張鷟亦有詩云：「少寒多燠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個四時皆似夏，荷花度臘菊迎春。」此均善寫臺灣氣候。故欲為臺灣之詩，須發揮臺灣之特色。如以江南花月、塞北風雲而寫臺灣景象，美則美矣，猶未善也。⁷³

又如：

臺灣景色之可入詩者，美不勝收，余曾採取數十條，載於《詩乘》及《漫錄》中。如秋雨連旬，謂之「騎秋」。「騎秋」二字入詩甚新。又如水紋蕩漾，謂之「魚花」。「魚花」二字入詩甚穎。至如南吼、北香之景，赤炭、白沙之情，又皆詩料也。⁷⁴

以台灣景色入詩，以台灣用語入詩（如上引「騎秋」）等等主張，既可凸顯本土景致之美，又能彰顯在地詩歌的本色。

以上，胡南溟、連橫等詩話家對於地方與詩歌創作之紛歧論見，為詩話學

71 鵬，〈大冶一爐（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2.14，4版。

72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3.08，3版。

73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270。

74 同註73。

開出一個可用以討論空間的議題。

在殖民統治與西方進步現代性的夾逼下，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往往欲言又止，各種不能說出口的言說產生文本意義空白，使得文本的詮釋不得不依賴於讀者的閱讀之中。也就是說，許多說不出口的空白只有作品與作者閱讀的相互作用，方始能產生意義。而這，或可以稱之為召喚結構（*structure of appeals*）。⁷⁵ 詩話為與詩相關之載錄，即記事或評論，不管是評論所涉的文本自身，或是記事所及的體察感受，文本都不再是被界定的客觀存在，而是在閱讀主體的投入中生發意義，因而接受美學亦將為極佳的研究徑路。當詩話家回首中國書寫傳統，他們接受的文化記憶是那些？這是一個值得探問，勢將展開各種不同觀點的問題。

綜上所述，以詩話做為東亞詩學傳統的載體，日治時期新舊文化、東西文化交織的複雜脈絡，本即存在著大可討論的空間。而中國文人社群為對抗主流文化政治而存在（*counter-hegemony*），並賴此進行自我組織，創造其獨有的歷史、傳統與認同（*representations of resistance*）。於是，混雜（*hybridity*）抗衡權威（*counter-authority*），成為被殖民者可利用的「第三空間」，進而發展存在於語言認同和心理機制之間，既矛盾卻又模稜兩可的嶄新過渡空間，在此異文化彼此交織（*inbetween*）與交錯（*crosscutting*），創生無數新的意義。

詩話瑣碎書寫的筆記形式，正好承載了這樣的一個第三空間。在這裡，在殖民政治下，被殖民者不斷回顧自己的文化之源，重複其文化的內容與形式，同時，與殖民者的他種文化融合、對話，創造新型式的文化實踐，以自別於優勢文化。這樣的作為在對正典的反思中益為清晰。它一方面重複自我文化，創造族群性區分，一方面與他種文化融合、對話，兩者同時發生，產生一種複調的文化政治。因而可以回應廖炳惠的看法，與殖民／後殖民互為依違的現代性，納入社會脈絡的差異，可能會是「不同的現代性」更適用於強調並以此凸

75 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6.

顯臺灣多元的文化傳承與歷史經驗。我們在連橫、吳德功、謝雪漁的詩話裡，都看到此一多元性，提供了我們觀察文化政治的可貴文本。

多元文化資源彼此作用下產生的第三空間的縫隙在言說中留下不確定性，為詩話研究開闢一條通往詮釋學、接受美學的徑路。其中是否也有誤讀的成分？如嚴滄浪的「詩有別才」說，其後的「非讀書窮理不能至」為引用者所遺忘，以為滄浪貶斥讀書等等；而謝雪漁甚至以新文學運動後，歷朝中土武官能詩者少，⁷⁶完全忽略在宋代以前，如唐之邊塞詩人頗有武職，則係對於中文古典詩歌史的誤讀。這些誤讀就只是錯誤而已嗎？還是另有文化隱含？

這裡將再次印證張伯偉的看法，詩話隨興撰述的性質，維持著傳統筆記文類的零碎形式，寫非主流的「小道」話題，透過報刊的傳播，更能留影當時的社會現象與時代意識，或以狎邪語調耍弄文章事理，或以插科打諢揶揄聖賢之道，或以閃爍之辭豔談男女之事，或以諧笑跨越殖民與被殖民的語言疆界，展呈詩話作者的自我認同、國家意識、性別想像等等，殊值得注意。生產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詩話正提供我們一幅完全的社會風情掛圖。

詩話有保存文獻的用意，有選詩的性質，有作史的努力，更有狹邪、歪打的小道，不僅承接國家、民族主義的大敘事，致力於正典的建構，也與底層通俗言說關聯。其研究，可以是詩話作者所身處的文學環境，從平實不偏的考察、反省台灣古典詩人、文學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他們如何再現台灣，而今日之吾人又如何再現是時台／日的交遊網絡，給予中肯的詮釋。如許俊雅、翁聖峯等學者，理解新舊文學論爭，建立台灣之詩話學體系，掌握其變化，自然也是必要的。

五、結論

台灣詩話，在日治時期的極盛，是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當重要詩歌已生產出眾多專家研究時，就詩話進行全面的整理與研究，是文學史植基之所在。「由於文學的歷史意義，鱗爪片斷的時間構成的存在狀況根本無從獲知，

76 雪漁，〈奎府樓詩話〉，《風月報》47期（1937.09.02）。

必須置入歷史的長流，於同質、異質的比較、對應，其歷史意義方得以具體凸顯。」⁷⁷因而，對單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往往失去對整體的理解。台灣文學，迄今未有一較完整之文學史論述，仍停留在「史綱」的階段，其主要原因或即資料不足，古典文學即其一例。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文獻，固然已有「全臺文」、「全臺詩」的編纂，卻尚未見及對詩話的關懷，則針對散在各處的「詩話」編輯，必然是未來撰編「台灣文學史」的重要參考素材，具有研究開發之重大意義。

居於這樣的事實，匯編所有相關的詩話材料，擴大台灣文學的版圖，避免文獻史料的流失，是絕對必要的。其次，將漫漶不清的文獻材料校勘以獲得正確文本，係教學教材或學術研究之基礎，毋庸置疑。中國有「歷代詩話」、「續歷代詩話」等等，成為劉若愚、高友工等學者撰述中國文學理論的主要根據；欲建立台灣的詩歌理論，應就台灣詩話進行有系統的編輯，不同角度的校釋，屬當務之急。

隨著文化理論的日新月異，學者於台灣清代暨日治時期歷史與文學的深層挖掘，出現不同的視角。日本殖民統治實為一複雜之情境，尤值得關注。研究者若能採取外延研究與內部研究並重的方式，自文學理論、實際批評中，參酌當代文化理論，對於台灣詩話此一歷史上既存之文本與文學現象——對中、台、日文化的交混、含混，給予適切的關心，細讀文本，並與當代的台／日詩人進行比較，爬梳台灣詩話如何延續中國詩話的歷史情境、體制與性質，而日本漢學的引入又如何在台灣詩話文本中進行交流、滲透，沾染日本詩話的觀點，使之有別於中土詩話的理論特色；台灣地區四季如春，經冬不寒，山川景物與大陸、日本有別，故以台灣地景風物入詩、台灣語入詩的詩話理論，又呈現怎樣的方國特色，在台灣人的主體性建構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從而圖繪文人的自我塑造、文學創作、翻譯與社會環境、文化思潮、全球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深入理解日治時代的台灣政治環境、與東亞文學的關係、文人生

77 江寶釵，〈論《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從一個女性主題出發〉（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4）。

命以及詩歌文化的發展。至若納入性別、族群、階層、空間等等文化議題，可用諸詩話者，更不勝枚數。詩話作為一代文獻所彰顯的文化方面的價值意義，此地僅為筆者就個人有限的知識所提供的觀察，更由於篇幅所限，所有的說明都是概覽的、片段的，然而，吾人已可略窺其豐富性。則詩話之可資進行深入之學術討論而未能在這裡提及者，實有待於學者來日之共同努力。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鷗社藝苑·第4集》（不著出版社，1955），油印裝訂。
- 王國維，《人間詞話》（台北：學海出版社，1982.09）。
- 江寶釵、林文龍、李知灝編，《生事歸清恬——張達修詠讚臺灣百首精選譯註》（台北：駱駝出版社，2006.07）。
- 江寶釵校釋，《雅堂詩話校注》（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11.09）。
- 吳德功著，江寶釵校注，《瑞桃齋詩話校注》（高雄：麗文出版社，2009.03）。
- 佚名，《鐵花仙史》（台北：廣文書局，1980）。
- 林正三、李知灝、吳東晟輯錄，《臺灣近百年詩話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
- 林南強，《南強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
- 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高雄：太普公關文化公司，2002）。
- 施梅樵，《梅樵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06）。
- 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0.08），頁105-181。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
- 崔成宗，《宋代詩話論詩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7.06）。
-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張伯偉，《中國詩學研究》（中國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
- 連橫，《台灣詩乘》（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雅言》（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雅堂文集》（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臺灣詩薈》（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郭紹虞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章學誠著，王雲五主編，《文史通義》冊二（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6.08）。
- ，《台灣文學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02）。
- 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中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09）。
- 蔡振念主編，《台日研究生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003）。
- 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5）。
- ，《中國詩話史》（中國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
- ，《比較詩話學》（中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2006）。
- ，《詩話學》（中國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 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幼華，〈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構接——以瀛社為例〉，《台灣學研究》7期（2009.06），頁29-49。
- 江寶釵，〈日治時期台灣藝旦養成教育之書寫研究——以「三六九小報花系列」為觀察場域〉，《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6期（2004.12），頁29-63。
- 李知灝，〈王松《臺陽詩話》版本考述與校勘〉，《台灣文獻》55卷2期（2004.06），頁111-130。
- 李聖華，〈論韓國詩人對明詩的接受與批評——以韓國詩話為中心〉，《古代文學研究》4期（2007.07），頁201-204。
- 林美秀、紀偉文，〈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期（2004.07），頁1-12。
- 林淑慧，〈《三六九小報》花系列專欄的女性身影及其文化意義〉，《文化研究月報》59期（2006.08）。
- 俞志慧，〈竹書〈孔子詩論〉的論詩特點及其詩學史地位〉，《漢學研究》21卷1期（2003.06），頁23-45。
- 徐慶齡，〈讀《寄鶴齋詩話》中論《詩經》〉，《雄工學報》7期（2006.5），頁43-

56。

張伯偉，〈論日本詩話的特色——兼談中日韓詩話的關係〉，《外國文學評論》1期（2001），頁20-31。

張良澤，〈讀《臺陽詩話》記〉（上、下），《台灣風物》33卷1、2期（1983.03、06），頁27-44、頁23-69。

雪 漁，〈奎府樓詩話〉，《風月報》46期（1937.08）。

——，〈奎府樓詩話〉，《風月報》47期（1937.09）。

曾進豐，〈許天奎「鐵峰詩話」述論〉，《高雄師大學報》21期（2006.12），頁19-32。

黃美玲，〈王松《臺陽詩話》初探〉，《台南家專學報》16期（1997.06），頁29-40。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台灣風物》47卷3期（1997.09），頁43-88。

劉振維，〈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南台科技大學學報》27期（2002.12），頁193-211。

鄭坤五，〈就鄉土文學說幾句〉，《南音》1卷2號（1932），頁12-14。

謝崇耀，〈連雅堂《瑞軒詩話》介紹〉，《台灣文獻》54卷2期（2003.06），頁377-396。

——，〈瑞桃齋詩話初探〉，《台灣文學評論》3卷1期（2003.01），頁77-83。

〈佚題〉，《詩報》192期（1939.01），頁29。

（二）學位論文

江寶釵，〈論《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從一個女性主題出發〉（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4）。

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4）。

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台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為例（1895-1925）〉（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許雯琪，〈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3)。

陳怡如，〈回歸風雅傳統—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

謝崇耀，〈日治時期臺灣詩話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2005）。

譚 雯，〈明代詩話與日本詩話比較研究〉（中國：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

（三）研討會論文

吳彩娥，〈風雅譜系：論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對日人漢詩的評述及其意義〉，「2007彰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2007.06.08）。

龔顯宗，〈邱濬川的詩觀與風格——由《綠波山房詩話》說起〉，「第四屆國際東方詩話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5.06.05）。

三、報紙文章

子曰店主，〈新聲律啟蒙〉，《三六九小報》15號，1930.10.25。

龍淵釣叟，〈拾碎錦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3.15，3版。

鵬，〈大冶一爐（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2.14，4版。

〈拾碎錦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03.08，3版。

〈讀酒樓詩話〉，《臺灣日日新報》，1906.07.17、20，3版。

〈青崖仙坡兩詩伯 將於來月一日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26.10.20，4版。

四、電子媒體

江寶釵，「臺灣古典女詩人」，台灣大百科全書網路版（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4）（來源：<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35&Keyword=%E5%A5%B3%E6%80%A7%E8%A9%A9%E4%BA%BA>）。

（梁）鍾嶸，《詩品·卷上·魏陳思王植》（來源：<http://www.cll.ncnu.edu.tw/hpoet/ha2.html>）。

楊慎，《升庵詩話》，（來源：<http://home.educities.edu.tw/f5101231/f52.html>，2011.09.15）。

五、其他

江寶釵，〈日治時期台灣民族文藝的形塑與流動〉，未刊。

施懿琳編，《「全臺詩」技術報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3）。

